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中国文库)

ISBN 978-7-101-07918-0

I. ①黄… II. ①湖… III. ①黄兴(1874~1916) - 文集②辛亥革命 - 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4845 号

责任编辑: 张玉亮

整体设计: 翁涌 李梅

责任印制: 王铁生

黄兴集

Huangxing Ji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

中华书局 出版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数: 431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978-7-101-07918-0

定价: 40.00 元

前 言

黄兴(1874—1916),是辛亥革命时期曾与孙中山并称的民主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胜利和失败的全部过程。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次民主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搜集整理和出版较为完善的黄兴文集,不仅对于黄兴思想、生平的研究,而且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黄兴一生从事革命斗争实践,他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主要散见于他的文章、讲演、函电、公牍、诗词等之中。一九一二年,上海新中国图书局印行有《黄留守书牍》,收录了南京留守府时期的一些公牍和函电。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六年,美国旧金山大埠华侨团先后编辑出版了《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伟人黄兴政见书》,分别汇集了黄兴在美国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演说词三篇及在上海的演说词四篇、函电两封。一九一八年,长沙出版的《黄克强先生荣哀录》,也编入黄兴的部分著作。这些早期的印行本,收录的范围均属有限。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台北影印了《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黄克强先生全集》,收辑了许多较有价值的黄兴论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仍然不够完善。我们在编辑整理这部《黄兴集》的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材料工作,曾遍历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在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普查了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出版的大量报刊,走访了一些与黄兴有交谊的辛亥革命老人或他们的亲属。对搜集到的资料,反复作了校核考订。同时,也参考并吸收了已有的成

果。现在献给读者的《黄兴集》，是一部较为完备的黄兴著述汇编。

根据《黄兴集》所提供的材料，我们试就黄兴的政治思想，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些简要的介绍和粗浅的分析，以就正于读者。

(一)

黄兴是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并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紧密结合，成为黄兴政治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急剧发展，警钟频传。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屈膝求和，将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割让与日本。一八九七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标志，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组织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陷北京；流亡西安的清朝统治者，竟然在皇皇“上谕”中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并伙同帝国主义列强，残酷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觉悟，促使他们纷纷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黄兴就是其中主要领袖人物之一。

一八九八年，黄兴由家乡湖南善化（今长沙县）进入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肄业。这时正当戊戌维新运动趋于高潮。这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学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黄兴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②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学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九〇〇年，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

① 《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②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页。

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一九〇二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弘文学院，并与杨毓麟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热情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学习和宣传。这个时期，各种革命书报开始大量出现。一九〇三年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相继问世，沉痛地讲述民族危机，无情地揭露清朝统治的腐败，热情地号召反清革命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要救国，必须革命；要革命，必须学习西方。这种宣传，在当时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迅速高涨，黄兴很快投身革命行列。他的挚友龙绂瑞曾记载：“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指黄兴）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时孙先生（指孙中山）之同盟会尚未成立也。”^①一九〇三年四五月间，黄兴参与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为清政府所阻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联络爱国青年，密谋革命。“各会员以满奴（指清朝统治者）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②六月，黄兴以该会运动员身份由日返国，经上海抵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并“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③然后登轮返湘，在长沙明德、经正等校任教，联络同志：“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④；并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革命宣传。^⑤是年秋末，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于长沙。由于当时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原始

① 龙绂瑞：《黄克强先生癸卯华兴公司革命避难 西园事略》，见《辛香榭诗存》。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

③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76页。

④ 龙绂瑞：《武陵杂忆录》上。

⑤ 参见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4页。

材料,但从“华兴”的会名和其公开机关“华兴公司”的牌号,从“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隐语^①,从刘揆一后来记述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关于“国民革命”的讲话^②,以及从章士钊等人的回忆录中,仍可看出华兴会的宗旨同黄兴的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〇四年秋,华兴会策划在长沙等地起义谋泄事败后,黄兴逃亡日本。一九〇五年七月,经日人宫崎寅藏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情投意合,共议将兴中会、华兴会等团体合并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词^③。黄兴对孙中山提出的纲领,完全赞同,衷心拥护,被推为会章起草员之一。在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他宣读了起草的会章,并提议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推孙中山为总理,自己则被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他还提请将原华兴会会员宋教仁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交同盟会作为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组织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从此,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黄兴的思想也进一步成熟,成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这是黄兴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要推翻清朝统治,就要有革命的武装力量。黄

① 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47页。

兴在辛亥革命时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还在同盟会成立初期，他为保密起见，就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会会员的会籍；以后直接领导了一系列起义，屡蹶屡起，英勇奋战，在武装推翻清朝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〇六年秋，黄兴派刘道一等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①，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②这里所称国民主义，即孙中山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年十二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在龚春台部所颁檄文中，宣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并且宣告：“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③这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也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第一次纲领较为明确的起义，对往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的发动暂时困难，黄兴协同孙中山转而南图两广、云南。一九〇七年九月，钦、廉、防城起义爆发，黄兴事先曾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内，谋内应未成。同年十二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继起，黄兴随同孙中山亲身参加战斗。此后，因孙中山曾远离国境，在国内策划、领导武装起义的任务，更主要地由黄兴担当起来。

一九〇八年三月，黄兴召集云南侨越青年二百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四十余日，先后抗击清军两万余，大小数十战，屡战皆捷。孙中山曾赞

①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③ 《辛亥革命》（二）第475—477页。

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①五月初，以势单力孤，械弹接济不至，退返安南。适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旋返河内组织援军，在老街为法警截留，被解出境。

一九一〇年一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赴香港主持军事，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无何新军起义又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愤前此历次起义被清政府镇压，欲“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博。”^②于是又有一九一一年四月震惊全国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由黄兴统筹领导。他先是奔走南洋各地筹款；及投身战斗前，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绝命书：“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③表现了献身革命的赤诚和决心。在实际战斗中，他亲率“敢死队”，直趋两广总督署，勇猛冲杀，虽枪弹击断右手食中二指，仍坚持战斗。这次起义虽然最后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正如孙中山所说：经过这次起义，“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④

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黄兴曾在两湖、广西、江、浙、皖诸省布置策应。及此次起义失败后，他支持同盟会中部总会诸人在长江流域发动、力争武汉的规划，称赞他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⑤他设想说：“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⑥这

①② 孙中山：《革命原起》，见《辛亥革命》（一）第14、16页。

③ 《致培臣、源水等书》（1911年4月23日）。

④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四）序文第16页。

⑤ 《致同盟会中部总会书》（1911年10月3日）。

⑥ 《致冯自由书》（1911年10月5日）。

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汉口失守后，他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二十四天之久的汉阳保卫战，从而保卫了武昌，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

这些事实说明：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领导者，黄兴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应当予以充分估价的。

(三)

辛亥革命以后，黄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接着又任过南京留守，但均为时不长。政权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去了，民国的招牌仍暂时保存着。在这种形势下，黄兴致力的重点有所转移。他一方面继续宣传民权主义，特别是大力鼓吹政党政治，意图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巩固共和民国；一方面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和教育，以求建设富强的国家。

黄兴曾经驳斥那种把辛亥革命说成种族革命的谬论，指出：“彼论者每谓此次之革命，仅为种族之革命。岂知所谓种族革命者，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然当含有革命之性质也。”^①一九一三年三月，他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写道：“世界大势，日趋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

^① 《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26日）。

担负国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①他还在致袁世凯等的电文中，对“忠”、“孝”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了新的、合乎时宜的解释，说：“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②。这些，显然是抗议袁世凯专制自为和官场腐败的呼声。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所视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并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大众，而主要是指他所属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而他所谓的“平民政治”，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代名词罢了。这从他（以及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党人）当时所着力鼓吹的“政党政治”主张看得很清楚。

政党政治也称政党内阁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的一种形式，相对于总统制而言的。这种制度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来的。黄兴曾解释说：“政党内阁制度创始于英，各共和国均采用之。即君主立宪如日本，近亦倾向此制。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多数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恃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容易通过，不致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③他认为：“欲民国现象日臻良好，非政党不为功。”^④因此，他支持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并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⑤；又支持宋教仁等将同盟会与其他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养成政党的智识道德，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⑥

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重要的形式，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

① 《〈国民〉月刊出世辞》（1913年3月）。

② 《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5月）。

③ 《致杨度电》（1912年11月22日）。

④ 《在国民党湘支部大会上的演讲》（1912年11月3日）。

⑤ 《致伍平一书》（1912年4月20日）。

⑥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3年1月26日）。

政党作领导核心,行使政权,这是正常的情况。问题在于哪个阶级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党?黄兴当时所说的政党,是指同盟会、国民党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是鱼龙混杂、组织松散的政党,这样的党不能真正代表人民,也不能依靠它来达到“利国福民之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如此,黄兴鼓吹政党政治,在袁世凯业已窃取政权而又专制自为的条件下,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回顾历史,一九一一年底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曾有过一段争论。当时,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制度。”^①后经磋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决定政府组织取总统制。但是,后来国家政权被袁世凯窃取了,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世凯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中之一规定:“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②三月十一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除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各种自由与权利外,同时决定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务员于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③显然,这是一个合乎时宜的改变。孙中山原来反对内阁制,理由是因为它是对总统“复设防制之制度”;袁世凯窃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革命党人现在决议改行责任内阁制,并将它明文载入当时国

① 《胡汉民自传》,转引自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第219页。

②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34页。

③ 《辛亥革命》(八)第30—35页。

家的根本大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以防止他专制独裁。正因为这样，袁世凯把这一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首先以阴谋手段暗杀鼓吹责任内阁制最力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继则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取消内阁制，废弃《临时约法》。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反复较量、斗争的过程。虽然，《临时约法》是纸上的东西，袁世凯既可不予执行，也能随时撕毁，后来孙中山、黄兴等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也确实失败了；但它在当时宣传民主主义，防止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①这个评价，对于黄兴在辛亥革命以后宣传的民权主义、政党政治主张，也是完全适用的。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正如列宁所说，这种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②黄兴是民生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他有时把它称为民生政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政策。他说：“夫共和政治求达于完全，其进行方法甚多，但吾人夙所主张者则民生政策，即国家社会政策是也。”^③“本党（指国民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④民生主义的内容如何？他说：“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⑤其实施办法，按照孙中

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

②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427—428页。

③ 《在湖南政界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11月5日）。

④ 《在国民党湘支部大会上的演讲》（1912年11月3日）。

⑤ 《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的讲话》（1912年6月30日）。

山的说明,就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①象孙中山一样,黄兴天真地认为:“苟实行民生主义,则熔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矣。”^②“采此政策,自可永享清平幸福。”^③他希望人们“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④

显然,这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就其要在当时中国防止资本主义来说,甚至是反动的空想。但是,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而这,正是民生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⑤

与此相联系,黄兴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黄兴是把发展实业作为建国之途和救亡之策来看的。一九一二年八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一文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勃兴。”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

① 《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② 《在国民党湘支部大会上的演讲》(1912年11月3日)。

③ 《在湖南政界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11月5日)。

④ 《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8日)。

⑤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427—428页。

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并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都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

在发展实业中,黄兴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一二年夏,他在《致上海昌明礼教社书》中写道:“窃以为西国实业日新月异,既以东亚为市场,即不能禁民之不购货。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非惟可塞漏卮,实可畅销国货。至其风俗,则学其醇而避其醜,必一求其形焉,则误矣。”这就是说:不能单纯抵制外货,而应积极发展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对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努力学习,而且要“翻新出奇”,有所创造;而对于外国的风俗习惯,则应吸取其健康有益的成分,舍弃其腐败有害的东西。这些见解,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黄兴的教育主张,同他发展实业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①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②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③,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④。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等等。这些思想,也是很可贵的。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如愿实现。这使他对于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逐步加深了认识。如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他在旅沪湖南同乡欢迎会上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

① 《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的讲话》(1912年6月30日)。

② 《筹办旅沪湖南公学募捐启事》(1912年7月)。

③ 《致教育部电》(1912年6月10日)。

④ 《在北京湖南女界欢迎会上的演讲》(1912年9月18日)。

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这里，黄兴讲的是“以国家为前提”；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广东驻沪国会议员举行的茶话会上说：“今国内之教育状态何如乎？仆曩在乡里，百里以内有小学四十余，取诸公款者为多。不及三年，闻所存不及七八所，资以办学之经费，皆消纳于筹备帝制及抵抗民军中。用知政治不改良，必无教育发达之希望，而吾所谓军事的国民教育，尤将等于梦呓矣！”黄兴本质上是民主革命家，发展实业和教育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此理想，他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斗争。这是在评论黄兴主张发展实业和教育的思想时，应当注意到的。

（四）

一九一三年夏秋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二次革命”，黄兴在南京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先是逃亡日本，继则移居美国。但他依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继续作了不懈的努力。

一九一四年春，黄兴在日本东京创办“浩然庐”，研习军事，明耻教战，并亲题匾额曰：“汉贼不两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又设立政法学校，培养政治建设人才。同年七月，他离日赴美，先后至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最后留居费城养病，直至一九一六年四月离美返国。

在美的近两年中，黄兴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概括说来，一是宣传反袁。如一九一四年七月九日，他在檀香山对《太平洋商业广告人》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名至实归的共和国”；揭露袁世凯的罪恶，以

“让世人了解中国目前的真实情况”；坚信“人民必获得最后胜利。”七月十五日，他在对《旧金山年报》记者的谈话中，深刻而有预见地揭露“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总统后，即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坚信“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充满了强烈的共和国意识”的中国人民，“对于袁世凯以及任何人的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还向记者申明：“与袁世凯立于对立地位，并将计划重建一个新政府。”他曾在给友人信中说：“弟此行务将袁氏罪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①他每到一处，即邀集或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除正面宣传外，还着力驳斥为袁辩护的种种谬论。如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为袁帝制活动张目，胡说“华人无自治之预备”，不适于共和，等等。黄兴著文予以严厉驳斥，指出：“美人之习于共和百余年矣，后此百年间美国统治术之进步当较既往而益大，可无疑也。然使后世之人谓今之美人不适于共和，有是理耶？又使今世之人谓尔之先代不适于组织一大民主国，有是理耶？由是推之，苟因华人遭逢不幸，被叛贼背弃明誓，阴谋窃政，剥去人民一切习于共和之权利，遂诿为人民能力不足，弗能进入人类自由平等正道明谊之坦途，其无理一也。民主政治最好的养成所，就是民主政治。”^②二是开展外交活动。目的在于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中国反袁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并阻止袁政府向美借款。一九一四年秋，袁世凯派陈锦涛为特使赴美商洽借款。黄兴闻讯后，即发动抵制借款的运动，对于美政府中止与陈锦涛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是筹款。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

① 《致董野长知书》（1914年7月27日）。

② 《辨奸论》（1915年12月）。